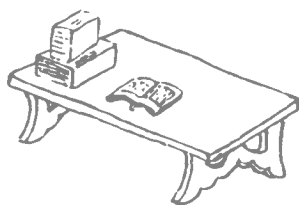


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近人因为受到西洋汉学家“冲击—变化”模式之影响，故讨论近代思想的变化时亦每喜自鸦片战争开始，视之为近代思想变化之起点，但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内部已经面临了各种挑战。

挑战是从几方面来的。第一是内治的问题，动乱接踵而来，各种制度也出现问题，尤其是风俗道德方面，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官僚的贪污腐化，在《李星沅日记》、《道咸宦海见闻录》等书中都可以充分看出。正因为人们对贪污腐化触目惊心，所以会出现像魏源等人的“挑菜会”以及倭仁等人的“吃糠会”。^①第二种挑战是鸦片及外夷的问题。

当时传统学问也起了种种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因为学术本身内在的发展而起：汉学内部出现了许许多多

关于挑菜会，见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01，《人日以七种菜饷客，约同人和吃》及《人日叠韵诗》。

4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因内在问题而产生的所谓“典范危机”。但最重要的是知识与现实、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当时知识分子有一个疑问：为何考证学如此发达，出版的书这么多，而现实世界如此龌龊混乱？这个现象显然与清初大儒的主张相违背。清初大儒说，研求圣经贤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再返三代之治。清季学者开始质疑这个大前提：为什么将三代社会的真相弄得愈清楚，似乎也愈不可能实行？是因为人们不肯留心致用，还是因为六经的社会与清代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以致不可能将六经原原本本实行于当世？简言之，这时候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知识与现实世界断裂”的危机感。人们怀疑当时居学术界主流地位的汉学考据，究竟与现实政术及道德风俗有何关联？这一门学问是不是完全失去了现实关照性，以至于学术自学术、社会自社会，汗牛充栋的考据学著作非但不能为现实世界带来一尺一寸的进步，反倒有恶劣的影响？

在《书林扬榷》一书中，方东树便将当时学问与现实世界的巨大断裂说得非常坦白，非常激烈。这本书虽然是在道光十一年刊行的，但发愿撰写则在道光五年的春天。他说当阮元（1761—1830）创建学海堂书院之次年，阮氏首先以“学者愿著何书”策问堂中学生，方东树听了觉得非常感慨，他认为这个问题大错特错，阮元不应该只问学者想写什么书，而不问所著的书有什么用。故他慨叹后世著书太容易，“殆于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乃发愤写了十六篇文章，其中有不少直接或间接批评清儒拼命著书而不管现实世界的风气。他在终篇中说：

藏书满家好而读之，著书满家刊而传之，诚为学士之雅素，然陈编万卷，浩如烟海，苟学不知要，敝精耗神，与

之毕世，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
此只谓之嗜好，不可谓之学。

这段话必须放在道光学术的背景下看。方氏是针对乾嘉学者拼命考证著书，只管在学术社群中树立地位与声望，而不管他们的专业研究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是否有任何关系而发的，所以他说那样拼命著述，如果“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则只能说是“嗜好”，不能称之为“学”。所谓“学”照传统儒家的理想应该是承担天下国家的实政实务。故他说：

君子之学，崇德修慝辨惑，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之于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明体达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不然，虽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

方东树代表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转弦易辙的士大夫共同的想法。他们都不满意当时学问的性质以及学问与社会的关系，他们想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简言之，一种整合政事、文章与道德为之一的整体观念。

他们也为宋学，乃至整个宋代伸冤，认为许多考据学领袖

方东树：《书林扬觝》，在《书目类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第九十二册，总页 41516。

同前书，总页 41517。

无情地攻击宋学，乃至“使有宋不得为代，程朱不得为人”。^①他们认为宋学不但是中国学术的高峰，而且宋儒对先秦儒家的把握，其实是最高明的，宋儒对现实的关照也远胜于考证学者。这一个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是清代后期思想史中一个关键性的变化。

以上这些观点基本是鸦片战争以前知识圈中的一个“意见气候”(climate of opinion)。不过毫无疑问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这一发展变得更加激烈。如果不能掌握上述的“意见气候”，便不能了解方东树的思想倾向，而如果不能掌握方氏的思想倾向，就不能了解他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了《汉学商兑》这部奇书。

在这里我要先用《仪卫轩文集》中的材料，来说明方东树的思想意趣，然后再谈《汉学商兑》。

方东树尊宋颂宋的态度与桐城文派有关。他的父亲是姚鼐(1732—1815)的学生，而他自己也曾经长期从学于姚氏。他的交游圈基本上也以桐城文派为主，这些人都看重朱学，对于陆王不能没有怀疑，^②对于考证学，则常持激烈批判的态度。方氏在许多著作中都透露了他尊朱的热情，如《重刻白鹿洞书院学规序》：

朱雅题辞，在《〈汉学商兑〉题辞》 方东树：《汉学商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页1。

在方东树：《仪卫轩文集》（清同治年间刊本 卷五 页12《重编张杨园先生年谱序》中他说：“自朱子而后 学术之差 启于阳明。”

慨然想见朱子当日所以集群儒之大成，使斯道昭明，如日中天，其遗文教泽一字一言，皆如布帛菽粟，后之人日游其天而不能尽察也。……必欲兴起人心风俗，莫如崇讲朱子之学为切。

他说六经都是为了致用的——“六经之为道不同，而其以致用则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而这个宗旨“唯宋人为大得”。②《文集》中有几篇长文，都是为了辨驳汉学家中相当流行的“理学亡国”论，③譬如在《明季殉难附记序》中说：

世之鄙儒乃犹痛诋道学，力攻程朱，甚且以明之亡归咎于讲程朱之学，是恶知天下古今得失之大数乎？

他又说清儒：

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

他认为这是因为考据家只为了求在学术社群中的名声，而不顾其他。在《书钱辛楣〈养新录〉后》中他说：

《仪卫轩文集》，卷五，页 31。

同前书，卷五，《〈汉学商兑〉重序》页 4—5。

同前书，卷六《书钱辛楣〈养新录〉后》，页 4—11。

同前书，卷五，页 8。

同前书，卷五《〈汉学商兑〉重序》页 5。

然则其所作《廿一史考异》亦何用也？不过搜觅细碎，眩博以邀名而已。

在《〈潜邱劄记〉书后》中也一再强调，为了名，这一些学者可以不要天下国家，^②说他们：

虽窃大名，亦徒荣华于一朝，而末由施用而不朽。

他也批评清儒之学有愈走愈窄，愈来愈小，愈来愈琐碎，也愈来愈离开现实的趋势，对于宋人之学也愈来愈不能以公平的态度去对待。在《〈潜邱劄记〉书后》中，他说顾炎武的书还有“本领根源”，所以其书尚莫能废；到了阎若璩，已经变小了——“其体例不免伧陋，气象矜忿迫隘，悻悻然类小丈夫之所发”。^④到了惠栋、戴震、臧琳等，又变得更小，更无是非，而且“专与宋儒为水火”，^⑤他们的学问不过是取汉儒破碎之学加以穿凿而已。他特别点出扬州江藩等人是使得汉学走入窄小狭仄之局的关键人物。在《复罗月川太守书》中，他说：

此其风实自惠氏、戴氏开之，而扬州为尤甚。及其又次者，行义不必检，文理不必通，身心性命未之闻，经济

《仪卫轩文集》，卷五，页 11。

同前书，卷六，页 1。

同前书，卷六，页 1—2。

同前书，卷六，页 2。

⑤ 同前书，卷五，《〈汉学商兑〉序》页 2。

文章不之讲，流宕风气，入主出奴。

引文中的“扬州”指江藩等人。在他们主导下，学问风气“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② 所以他要向这些被“扬州佬”所窄化的学问开火。这也是为什么此下我要花费一些篇幅谈方东树与扬州学圈的关系之故。

二

在考证学初兴时，人们并不将自己局限于汉学。把汉儒之学与孔学等同起来的新典范基本上是惠栋（1679—1758）所确立。在《九经古义》的序中，惠栋说，由于经书的意义惟有透过汉儒的注解才能被正确地把握，所以后人不应该作有别于汉儒的解释。

苏州与扬州是惠栋阵营的主要根据地，他的学生江声（1721—1799）、余萧客（1729—1777）等人都活跃于这些地方。扬州是清代中期最繁华的城市。只要一览当时全国交通图，便可知它是水陆交通辐辏之地，提供了一个极便利的交通网；而只要一查清代藏书家的资料，也知道扬州同时也是藏书极富之地，在官方藏书方面，《四库》的七份抄本中，便有一份在扬州，再加上当地大盐商对学术文化的赞助，这些条件吸引了全国各

《仪卫轩文集》，卷七，页6。

同前书，卷五，《〈汉学商兑〉序》，页3。

惠栋：《九经古义》，收在阮元编：《皇清经解》（台北，汉京，1980），卷三五九《述首》，总页14379上。

地的学者。扬州的学风也深深影响过往的学者，戴震（1723—1777）在扬州停留三年之久后，思想便很受惠氏之影响，尤其是反宋学的态度。

扬州也孕育了阮元（1764—1849）及江藩两位汉学领袖，他们都是余萧客的学生，算是惠栋的再传弟子。阮元是一位极成功的学术官僚，曾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并成为考证学的重要支持者。比起阮元，江藩便寒微得多了，他不曾获得任何功名，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位学术领袖。江藩也曾试着通过管道获得仕进机会，并曾在1786年详注乾隆的诗以进呈，但是当时北京正因林爽文事件而一片混乱，故乾隆无暇分神应付江藩。^②失去这次机会后，江藩来往于北京、扬州、杭州等地。在这段日子里，他的名著《国朝汉学师承记》逐步成形。1811年，这部稿子已大致完成，并在江南学者手上流通。1817年，二十六岁的龚自珍也看到这份稿子，并写信反对江氏以“汉学”二字称呼清代考证学。不过，江藩并未为其所动。江藩在1818年受阮元之邀到广东参与《广东通志》的编纂工作，同时刊印《师承记》。

在《师承记》中，江藩对汉学与宋学作了非常清楚的划分。他很不情愿地把两位清代考证学开山大师顾炎武、黄宗羲放入《师承记》的《附录》部分，主要是因为他们仍与理学的传统有关，并曾参与抗清的活动。^③他把不是完全符合汉儒训诂之学的

惠氏曾说宋儒之祸过于秦焚，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商务，1968），页321。

② 《江藩传》，《清代碑传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189。

③ 《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33。

摒弃不录，^①与宋学有一点牵连的也概被拒绝。^②故恒慕义 (Arthur Hummel) 形容江藩的这部书是第一次系统建立清代经学系谱的尝试。

《师承记》得到阮元的大力支持。阮元在该书的序中强调说，因为汉儒接近儒家先圣的时代，而且是在道家与佛学被大量吸收之前，他们对儒经的训诂比后来的人更为可靠。^③阮元表示他完全同意江藩的去取标准。从 1825 年起，阮元开始编刊《皇清经解》，他在选目时所立的标准也大致与《师承记》相近。^④

方东树比江藩还落魄。方东树数度参加科考，但直到五十岁仍未能博得一第，他在江南各地转逐，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从后人为他做的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寻求职位糊口，^⑤尤其是漂泊扬州那几年更是难堪。^⑥因为家贫，以致一家数口死去多年而未能下葬。他的妻子贫病将死之际，方氏却为了糊口，不得不辞家远行，而且为了保持馆职，即使闻说祖母病危，也不能赶回。像这类例子，在苏惇元为他编的年谱中更是屡屡见之。在《答姚石甫书》中，他这样说：“仆

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与《汉学师承记》合刊，页 147。这是江藩之子江钧综括性的话。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79）册 3，页 589—590。

③ Arthur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1972). pp. 137—138.

《汉学师承记》，页 1。

何佑森：《阮元的经学及其治学方法》，《故宫文献》2：1（1970），页 22。

⑥ 郑福照：《清方仪卫先生东树年谱》（台北：商务，1978），页 5。

⑦ 《仪卫轩文集》卷七《答姚石甫书》，页 15。

孤穷于世，遑独不见收之人，乃至无一人可共语。”^① 他的孤立是两方面的，经济上的困窘，学问上的孤立，而这些都与他是宋学的鼓吹者而不是当令的考证学家有关。其实这并不奇怪，在汉学极盛的时代，理学家不易得到学术主流的青睐。以方东树的老师姚鼐为例。姚氏虽然在朱筠的推荐下，于 1771 年进入四库馆撰写提要，但是因为他的理学背景，所撰提要经常被其他馆臣抵制，逼得姚氏最后辞职离开。^② 离开四库馆后，姚开始公开表示他对汉学强烈的不满。

姚鼐早年也曾想接近考证阵营。他曾希望成为戴震的学生，但是被婉拒了。即使是离开四库馆并公开批评汉学，但他对汉学的长处仍有充分的认识。他所不同于当时考证学者的，是希望合义理、考证、辞章为一，而且他认为这对考证学的发展有利。在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娴于考证，方东树便是其中一个。在《汉学商兑》中，方东树便公开承认清儒在音韵训诂之学上的成就古今无双。他不断提醒学生，朱子并不曾轻视训诂音韵之学，并强调自己对它们的重视也不减于并世的考证学者。

方东树颇能欣赏清儒的某些作风。在《汉学商兑》的“序例”中，他称赞余萧客的《古经解诂》详注所引材料之出处。引书注出处虽起源更早，但是到清学才形成一个特色，《引书

仪卫轩文集》卷七《答姚石甫书》，页 13。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43, 146, 156.

方东树：《汉学商兑》（此下简称《商兑》）（台北：商务，1937），页 20—21。

《商兑》，《序例》页 3。

考》一文的出现即是一证。^①方东树在《商兑》一书中便刻意模仿这种体裁。他很明显地是想吸收汉学的长处，并摆脱宋学玄想无根之病。

1819 年春天，方东树在《广东通志》局中，成了江藩的助手。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二人相处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是方东树在完成所负责的工作后便离开广东了。方东树曾于五年后重返广东，教馆于阮元的衙门。当时《皇清经解》的刊刻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而在这套大书中，凡是牵涉理学的作品多被排摈，即使是那些被尊为清学开山之作的名著也不例外。^②这可能使得一旁的方东树感触良深，一般相信，就在 1824 这一年，《汉学商兑》的稿子已大致写成，不过它是在 1831 年，也就是《汉学师承记》出版十三年后才刊行。江藩就在《商兑》出版的这一年去世。有趣的是，针锋相对的两本书都由阮元所刊行，这或许象征着阮元后来逐渐显露出的一种同时包容汉宋之学的趋向。

三

《商兑》一书主要是为宋学辩护，同时攻击汉学的缺失。在撰写的过程中，方氏时时不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不断地展示自己的考证学素养，然后从内面来攻击它。为了擒贼擒王，考证学大师惠栋、戴震、钱大昕、阮元都成了攻击目标，尤其是那些反对人讨论宋明理学的人。

《商兑》，《序例》页 3。

何佑森：《阮元的经学及其治学方法》，《故宫文献》，页 22—26。

方东树批判他们的方式通常是先引一段考证学者最具代表性的话，然后施以尖刻的批评。我们可以清楚感觉得到，《商兑》的第三部分明显地是针对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与《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而发的。

当汉学在它的高峰时，几乎无人敢撷其锋。章学诚（1738—1801）《文史通义》中因有大量批评考证学者的文字，所以整部刊行是在他死后的事。清季陈澧（1810—1882）有一大批未刊稿在本世纪初被发现，它们之所以未刊，也是因为其中有太多攻击考证学的文字。这说明在“狐狸”当道时，极少“刺猬”敢公开挑战。^①因此，像《汉学商兑》这样一本系统而大胆地攻击考证学之书在 1831 年出现时，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了。

首先，方东树指出汉学研究的一个典范危机。由于清儒大多认为六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这个体系内的矛盾并未被严肃地考虑过。而清代的考证学者心中也大多假设着，透过客观严谨的考证，可以恢复古代各种历史制度之真貌。而且因为这是客观的研究，而不是理学家的玄思，故可以避免缴绕不休的争论。

这种乐观的自信，在凌廷堪《校礼堂集》中的《戴东原先生事略状》里表现得最清楚：

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 601。“刺猬”与“狐狸”之喻，请参考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台北：东大图书，1996），页 98—99。

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

这种乐观的自信也时常为出土文物所证佐。譬如戴震对古代的钟所作的历史重建工作，在乾隆中期被一个在陕西出土的实物所印证。

但方东树敏感地指出，清儒对同一个名物器数的研究却常常得出互相冲突的结论。讲求客观的考证学家无法保证其客观性。方东树因为熟知考证学的成果，所以他很快发现这一个各人研究成果不能互洽的现象。他非常敏锐地指出：

又按汉学诸人，坚称义理存乎训诂典章制度，而知考工本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本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迄不知谁为定论。他如秦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贺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方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

方东树说，过去在王阳明良知说的影响下，因为每人皆以一己的心作为依据，各执一是，争端百出。而清儒正是要以客

《校礼堂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卷三十五，《戴东原先生略状》页 8。

②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82.

《商兑》，页 165。

观考据来取得确定答案。何以声称能够确定而客观的汉学，竟然“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就好比不同的人作同一组实验，却又得出不同的结论来。方东树认为这一现象本身即蕴含著汉学内在的危机。

接著，方东树认为清学有一种从“实学”到“虚学”的现象。考证学有一个共喻的前提：当儒家经典的原义以及制度器数的原貌被重构后，圣人的理想便可以付诸实行。至少在清代的初期，名物度数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治国平天下。即使到了清代中期，考证大师们如戴震、钱大昕（1728—1804）等仍然奉行这个主张。

但是，考证学的发展却逐渐遗弃了这个前提。在现实上，因为文字狱的压力，使得士大夫不敢太在经世或现实批判上用心。但最出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学者们发现，即使车制、明堂、冠冕之制皆能一一复三代之旧，而且没有内在的矛盾与争论，它们也未必能在当代社会中实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车制、宫室没有考证清楚之前，彻底复返三代之旧的热情是无法浇息的，一旦把它们弄清楚后，反而觉悟到原来它们无法付诸实行。在考证学的先驱们身上，这个困境已经出现了。顾炎武要以三代声音改换今音，可是有一次他做客于朋友之家，清晨晏起，朋友对他大喊“汀茫久矣”时，顾氏竟大惑不解。后经朋友点明，“汀茫久矣”是“天明久矣”的古音，足见以三代之旧施之当世的困难了。既然三代之旧不能在当世实行，而且也没有什么积极想推动它们，那么所谓“实学”又在何处落实呢？方氏说，清儒夸称他们所治的学问是言必有据，证必多端。相对于理学家而言，他们引证丰繁，也确是至“实”之学，但是到头来却在现实致用上成了至“虚”之学。《周礼》难读，而

戴震有解；名物难知，而程瑶田《通艺录》中有图。^①可是，考古的热情虽在，将“古”实施于“今”的可能性没有了，愿望也逐渐褪色了。方东树在《商兑》中便引了一节段玉裁（1724—1815）描述其师戴震学术精神的话，并施以激烈的批评。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

方东树批评说：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

方氏同时也指斥汉学的两大问题：第一，他说“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之说是荒谬的，因为考据工作虽“证佐数百千条”，但“反之身己心行”却毫不相干。第二，他说考据工作“推之民人家国”，亦了无益处，不得所用。故不管从道德或政治上看都没有价值。方东树抱怨说，考证学承诺要将所考的名

譬如程瑶田《释宫小记》，在《通艺录》（上海：安徽丛书本，1933）册九，页34—35。

《商兑》，页122。

同前书，页39。